

# 古代志异叙事与当代文学

□马 兵

志异叙事是传统文学重要的叙事传统之一,其在五四时期曾遭受严厉的挾伐,但是这种极具人文魅性的文学形式却异常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当代文学对志异传统的继承,不仅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学人文性价值的继承。

1936年,《论语》杂志推出上下两册《鬼故事专号》,周作人、施蛰存、老舍、林庚、徐訏、梁实秋、丰子恺、许钦文等各流各派的作家饶有兴致地“鬼”话连篇,堪称当时文坛的一帧小景,大约也会让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们有别样的感慨。因为在启蒙大潮中,新文化人对鬼狐之论可谓火力全开,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陈大齐的《辟“灵学”》、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都力陈灵鬼之说的虚妄。不料不过十几年,便从捉妖打鬼变而对鬼津津乐道,此中缘由,除了时代语境的不同,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新文学内部对重建文学人文魅性的文化自觉。

《论语》为何策划这个特别的专号,编辑邵海美在编后记里做了这样的交代:“我们编这‘鬼故事专号’,虽如施蛰存先生所说,是为‘正在对于西洋文学中的鬼故事发生很大的兴趣’,但事实上,那动机还要早。因为我们每次谈到文学总会讲起‘通俗小说’。我们常想,那所谓礼拜六派的小说,的确曾继承了红楼、水浒等在通俗文坛上的位置,……通俗文学是决不会绝迹的。”又说,“况且鬼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个极重要的地位的,中国的鬼故事和外国鬼故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或则是神话,或则是讽刺;而后者则能彻底表现鬼的恐怖。”这番话说得不甚明晰,但包蕴的两层意思还是颇有意味:其一,说鬼谈狐的志怪叙事是中国文学史自有的传统,与西方的哥特类小说有分殊;其二,与新文学并行的通俗文学保存了这个传统的内容,值得新文学反思和借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早就指出过,道家的“称道灵异”为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从六朝志怪到唐人传奇,再到宋代话本和明清神魔小说,“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灵异”叙述一直蔚为大观,它们借由对幻魅、奇诡的渲染,构成中国文学重要的叙事向度,乃至是一种诗学传统。德国汉学家莫宜便认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可定义为:跨越通往‘异’的疆界。”所谓“异”,即指奇异、鬼怪、非常、不平凡的形象和事件,“它们贯穿整个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不断以千变万化的形式活跃在中国短篇叙事作品之中”。五四时“赛先生”大旗高帜,新文学运动以祛魅作为价值追求,狐鬼之事被视为迷信封建遭到弹压也是题中之义。但对文学自身而言,过分祛魅所造成的人文魅性的丧失也必然导致审美空间和思想空间的窄化,对新文学的建设未必全是好事。

1918年“打鬼”之后,1923年又爆发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由此使新文化运动着力推出的“赛先生”摇身一变而为“赛菩萨”,从“器”“用”的层面上升为“道”的境界,不但普遍适用于物质界,社会人生的意义危机也由此来提供解决之策。用王星拱的话说便是“科学即真”。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态度体现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对现代理性的乌托邦式期待,他们用了“科学”代替仁德,改变了人生价值选择的优先性法则,这一秩序的异质对换蕴含了两大吊诡:其一,五四启蒙者均以西方思潮的弄潮儿自居,但是他们对于科学主义的推崇却显然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与五四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相对应的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衰落。一战后,西方哲学分流的态势日趋明显,长于理性逻辑的分析哲学渐趋式微,而关注人类命运与生存的生命哲学渐成主流,如克罗齐、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虽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之处便是都对科学理性制造的霸权和偏至进行反思,希冀人们走出唯科学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动力不足等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往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大多数从文化产业概念考辨和历史爬梳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产业实务等宏观问题,并偏重于产业经济,或体现了学科草创期学者对于学科范畴的廓清努力,或呈现为面对现实问题的应激性回答。而深入到文化产业这一兼具文化性与产业性、横跨艺术与经济两大领域的交叉学科内部,对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对接等关键学科命题的重大问题作正面而审慎探讨的理论著作实属罕见。

由李凤亮教授等人著的《艺术原创与价值转换》(海天出版社,2014年版)以整体性的眼光对文化产业语境下艺术价值、艺术原创与文化产业内在逻辑做出了统筹思考,对现阶段文化产业视野下的艺术原创重要性做出学理性的阐释;对各类原创艺术在当代文化产业勃兴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价值转换提出对策和方案;通过对当代艺术中介、艺术消费、文化环境、文化政策、文化教育、媒介环境的分析与研究,为艺术原创和价值转化提供可作为凭据的客观材料和数据。

**一、理论体系新颖独特,凸显时代性和前沿性**  
传统的艺术价值观,偏重同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审美价值、世界价值、永久价值,而忽视艺术的外围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道德价值等。该书恰好是对此观念的解构,在当代人普遍追求财富成就感的功利文化氛围中,在经济理性畅通无碍的文化产业语境中,“我们在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世界价值、永久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同时,必须客观辩证地

和唯理主义的偏失,在生存的意义上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素来被视为保守的玄学派人物如张君勱,反倒与代表最新趋向的西方思潮存在对话与对接的可能。事实上,1930年代张君勱撰文回顾科玄论战时,正是如此强调的:“我所以讲‘人生观’之故,由于我在欧时读柏格森、倭伊铿、黎卡德诸书之影响,深信人类意志自由,非科学公例所能规定。其立言之要点在此。”其二,科学派尽管对传统式的人文关怀持决绝的排斥态度,但是促使他们建构新科学信仰的根本思路却彰显了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制约。一般认为,丁文江、胡适等科学派对科学功能的强调易陷入韦伯所谓因对“工具理性”的迷信而疏忽“价值理性”意义的误区。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等口号的倡导从一开始就是把之作为“价值层面”的形态来对待的。所以不仅自然知识、客观真理的索解要诉之于科学,探寻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意义也要乞灵于科学。自觉不自觉地,启蒙知识分子把科学塑造成为天理与人道合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恰恰正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科玄论战中科学方的胜利看似为进退失据的民众找到了新的信仰,但因其对人文精神的蔽抑,也无以提供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事实上并无助于解决五四启蒙革命以来人们在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上的危机。也因此,富有玄学和神秘意味的志异叙事会在五四浪潮阶段卷土重来,且不绝于缕。如果说前述的《鬼故事专号》只是端倪,那熟悉现代文学的读者,在鲁迅、沈从文、吴组缃、施蛰存、张爱玲、徐訏、爵青等辈笔下,可以一再读到诡奇灵怪篇章,关于“异”的叙述兜兜转转,亦成大观,诚如王德威先生所言,这类作品“代表了我们在去与回归间,一股徘徊悬宕的欲念”,“衬托出生命想象更幽渺深邃的层面”,“在死与生、真实与虚构、‘不可思议’与‘信而有征’的知识边缘上,留下暧昧痕迹”。“异”叙事之所以有如此魅惑的力量,乃正因为它以一种张力的存在,在对理性万能的科学主义和启蒙综合主义的反拨中,建构起不同于主流的富有人文魅性的叙述谱系和想象空间,并与本土的叙事传统形成内在的呼应。丸尾常喜论述鲁迅时所提出的“人与鬼的纠葛”倘引申开来,未尝不可作为对现代文学中庞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志异叙事线索互相纠葛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话语大一统的语境里,驱妖赶鬼又成时代主题,“不怕鬼的故事”借由体制的宣传而盛行一时。然而至1980年代,种种魅惑玄怪的“异”叙事跨越肉身及时空的界限去而复返,正如魂兮归来,尤其见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文化语境中,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发动一般被惯性地解读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欧美现代派文学冲击和启发之下的回应与模仿,而疏忽了志异叙事传统的浸润和熏染,倒是当作家自己的认识很明确。比如莫言,他其实早在1987年便发表文章,表示要避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两座灼热的高炉”,回到中国的民间和古典。他撰有两句打油诗:“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来表达对前贤蒲松龄和伟大的志怪传统的致敬,又说魏晋小说是他重要的艺术源头。这样的“认祖归宗”,在韩少功、阎连科、贾平凹等作家那里也有体现,比如,贾平凹1989年总题为《太平山记》的20则笔记体小说,活脱脱就是一当代聊斋,也预示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鬼气缭绕,率腥不进”的写作路向。

再看先锋文学,笔者以为,在公认的叙事革命、暴力美学和话语狂欢几个基本向度以外,关于“异”的叙事亦不可小觑。苏童的《仪式的完成》《樱桃》《菩萨蛮》、杨炼的《鬼话》、叶兆言的《绿色咖啡馆》、余华的《世事如烟》等都力图通过对超验的魅魅形象的描写来捕捉匆遽时代里人们恍惚迷离的日常感触。这种返魅的叙事不但接续起汉语文学中

关于“异”的探讨的悠久诗学传统,也在寻根文学之后用更决绝的方式质疑了1980年代的人的神话与启蒙的神话。比如《樱桃》写邮递员尹树在一个医院废旧的铁门边总能碰到一个向他询问信件穿白睡袍的女孩,女孩叫樱桃。尹树对樱桃由好奇而同情,答应去医院探视她。等去医院那日,才知道樱桃所在的病区早改成了太平间,而樱桃本人则是一具很久无人认领的冰冷的尸体,手里居然还紧握着尹树送给她的手帕。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把生存的可能性概括为:“异化和疏远人生基本的脆弱性和偶然性之感;理性面对存在的深奥而无能为力;‘虚无’的威胁以及个人面对这种威胁时的孤独和无所庇护的情况”。苏童的这篇小说鬼意森然,非常有效地表达了非理性的现代生存感受,“在永恒的忘却以及偶存的记忆间,鬼魅扮演了媒介的角色,提醒我们欲望与记忆若有似无的牵引”。

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对超验叙事与故事的格外青睐,显然也回应了1980年代初的启蒙思潮曾再一次允诺的科学和理性掌控的前景,当人们把伤痕记忆倾诉失落之后,发现单靠理性依然无法缝补虚无和匮乏的人生感受,抛开令人目眩的现代小说技巧,这些作家们引“鬼”上门,投射的乃是“异”之将“常”的焦虑,看重的是志异叙事对悖论荒诞的人生体验的体贴传达,以及其丰沛的想象所赋予文学空间的内聚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重视文学的魅性、重视对传统叙事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重视贴伏地面的写实与飞扬的想象力之间的平衡渐成为一种共识,不但前辈作家日益精进老到,“70后”和“80后”的新生力量也格外重视此一向度的掘进。比如,“70后”作家中的偶像兼实力派冯唐在小说《不二》的跋语中提到自己有“子不语”三部曲的写作规划:“在成长之外,我决定写我最着迷的事物。通过历史的暴力乱神折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谬误和真理。”《不二》(天下卵)和《安邦》三部皆取历史题材加以后现代理解的点染,注重故事的“丰腴、温暖、诡异和精细”,彰显出对接传统的主动跟热情。借新概念作文大赛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颜歌对“异”字情有独钟,她的《锦瑟》《飞鸟集》《异兽志》和《朔夷》等,驰骋奇幻,放任魅惑,以异类精灵的视界重新标注青春别样的体验,其敷衍旧事、谄熟志怪、长于意象营造的习气在在可见。与此同时,借助网络平台风行的盗墓、玄幻与穿越小说也不断打捞着散落在历史文学长河里的“异”的珍宝,刷新大众读者对本土叙事元素的新认识。

当然,强调志异叙事并不是说凡遇鬼怪类的作品就点赞,要者还在于作品能否借由志异和奇幻扩充文学的风格和品格。《论语·鬼故事专号》的首篇是周作人的《谈鬼论》,其中说道:“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此人。”说到底,“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统合力之下,在消费主义的蔓延所导致的均质化让本土智慧逐一式微的情形下,志异叙事作为中国文学的独特基因,其在当下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异”如何花样翻新、骇人人心,而在于可否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借助这些资源尝试与畸变的现代社会现实沟通对话,可否以玄学之光照拂人们被资本和欲望蔽抑了的灵性,可否真正构成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相抗衡的人文性倾向。

晋人郭璞在《山海经》序中道:“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其斯之谓与!

##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 文化产业语境中的艺术价值

□周礼红

认识和理解消费语境中的艺术变相,充分肯定并认识消费语境下艺术的相关外围价值,特别是商业价值和产业价值。”

**二、理论观点切合实际,为我国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把脉定向**

首先,该书开宗明义,对文化产业语境中的艺术价值观的变化进行了清晰的论述,重视艺术商业价值和产业价值,阐明创新艺术价值理论的出发点和实践依据。

其次,该书围绕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指出艺术的原创性是艺术市场价值的基石,当今社会“‘文化产业’只见‘产业’而未见‘文化’,因此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并造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一是艺术家被市场绑架,成为艺术工人,丧失了创作的独立性和对于艺术本位的坚守;二是艺术生产日渐工业化,流水线作业逐渐深入艺术生产过程,艺术原创性被复制性取代;三是在产业化催下,艺术日渐功利化,放弃了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传承、传播的责任,开始以粗制滥造的内容垄断文化市场。由于盲目追求艺术的市场价值而忽视了艺术的原创性,才造成此种现象。因此发展文化产业要高度重视艺术原创性。艺术原创即以体现在文化创意产品中的

(江 闻)

## 全国情感主题散文大赛揭晓

**本报讯** 第二届全国情感主题散文大赛日前在山东高密颁奖。本次比赛由《散文选刊》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累计收到海内外的应征稿件5000余篇(件),内容涉及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主题,共评出获奖作品80余篇(件)。

活动期间,《时代文学》《绿江》《陕西文学界》等文学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与获奖代表举行了见面会,并就当前散文创作进行了交流。

(张殿武)

## 浙江乌镇设立戏剧孵化基地

**本报讯** 近日,由田沁鑫执导的话剧《山楂树之恋》正在浙江乌镇西栅景区进行创作排练,并将于7月3日在乌镇大剧院首演。据悉,该剧是“乌镇戏剧孵化基地”的开幕之作,标志着乌镇在发展和保护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近年来,乌镇始终注重对文化的保护挖掘工作,除恢复和展示了多种传统文化元素之外,还于2013年创立了乌镇戏剧节,使民俗文化与高雅艺术实现了有机统一。“乌镇戏剧孵化基地”由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打造,公司将与诸多知名艺术家展开合作,邀请艺术家赴乌镇创作与排练戏剧作品,并在乌镇进行首演,以培育和丰富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同时,为了扶持和鼓励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乌镇戏剧孵化基地”还设置了青年艺术家驻地创作项目,邀请青年艺术家携带有作品前来乌镇演出,并为其在乌镇创作出新的作品提供条件和便利。

在乌镇封闭排练期间,《山楂树之恋》剧组灵感不断,多次对作品进行修改和打磨。田沁鑫表示,自己很喜欢乌镇的环境,“希望在乌镇推出最好的爱情故事。”(王 觅)

弘扬中华文化的前提是要有一种辩证的科学态度。我们不能说中华文化是一块没有瑕疵的美玉,也不能说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观没有任何需要否定的东西。比如先秦的思想家杨朱思想就值得商榷。

那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我以为最具概括性的表述当推宋人张载的“民胞物与”。意思是说,但凡是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分类来看,在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最为天下贵”,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权、利用权,一方面又强调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从《易经》的话说,就是“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在把握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主张推己及人,将关爱他人视为内在于人的主动要求,而不是被动接受的“道德律令”。例如,儒家讲“仁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讲“兼爱”,“视人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在把握全社会的关系统,中华文化主张“天下为公”。在把握国与国的关系时,中华文化主张“协和万邦”,“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在抽象的意义上,上述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便像血液一样渗入我们的制度、精神和行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科学社会主义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

众所周知,2008年中国汶川的抗震救灾,创造了世界救灾史上的奇迹。当年5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对中国在救灾中表现出来的“有效的政府能力”给予高度评价。政府高度的动员力和组织力,当然是抗震救灾胜利的根本行政保证,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种力量,那就是来自民间的巨大得以扭转乾坤的力量。灾害一旦发生,就有四面八方众多普通百姓自发地聚集汶川,义无反顾地投入救灾。当时,我从电视节目中看到这样一个镜头:记者在飞机上采访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农民。问:“你来抗震救灾,是否有组织?”答:“没有。”问:“是自费还是公费?”答:“自费。”在他看来,汶川与唐山虽远隔千里,但是那里受灾的人们都是他的至亲,他应当去帮助他们。很明显,这是“民胞”观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开出的灿烂花朵。

早在1954年,中国政府就正式提出并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又提出推动构建和共谐世界的主张。所有这些,正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中国“协和万邦”的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外交理念。65年来,中国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65年来,中国一向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一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65年来,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从未附加过任何捞取好处的条件。更让世界人民称赞的,是中国人民的那种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1972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的要求”。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被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称为“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早在上世纪70年代,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阿·汤因比就指出:“中国人这种智慧最适于人类未来的发展。”“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融合与协调的智慧”,所以中国永远不称霸,当然更不会统一世界。中国只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好,通过自己的榜样力量,促使人类社会和谐起来,美好起来。

术原创和价值转换的具体路径,论述条理清晰,现实针对性强,方法正确可行。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家深受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对世俗价值观产生不同的认可和接受,传统文人的清高风骨所剩无几,各自向名利场挺进。这必然导致艺术家的原创活动方式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为此,一方面艺术家要真正回到艺术家的核心问题,即艺术原创性上来;另一方面,艺术家要注意文化产业化过程中艺术原创方法的更新,特别是新技术的应用与艺术原创方法的更新、各个行业之间的结合与艺术原创方法的更新。此外,我国要大力发展艺术教育,精心培养有创意才能的艺术家。

其次,该书指出影响艺术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的关键因素。“买家影响市场价值,专家影响美学价值”。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品经济价值的决定因素,除了创作者在创作该作品时所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和作品的稀缺程度之外,其他因素都跟所谓“专家”密切相关。而且,很多对艺术鉴赏不很在行的买家在购买艺术品之前也会征求专家的意见,按照专家的建议购买。因此,可以说专家是艺术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的关键因素。

再次,该书从艺术门类的角度提出解决艺术价值转换为市场价值的具体方法:一是文学、音乐、书画、雕塑等传统原创艺术在价值转化过程中的现存问题及解决之道;二是指出电影、动漫、演艺、设计等新兴原创艺术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 甬剧《筑梦》在京上演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13日、14日,由中共浙江宁波市委宣传部和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打造,宁波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大型甬剧《筑梦》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以历史上宁波籍建筑商人沈祝三为原型,讲述了沈三倾囊建造武汉大学的故事,诠释了为圆教育强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坚定信念和“信义行天下,爱国又爱家”的“宁波帮”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浓郁的地域特色。《筑梦》由陈薪伊执导,王晓菁、王俭担任编剧,宁波市甬剧团演出,郑健、王锦文、虞杰、严耀忠等主演。该剧今年在宁波首演以来已巡演近60场,广受观众好评。陈薪伊表示,主人公守旧而坚韧的态度正是现代人所缺少的,希望通过这样一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的作品,向广大观众传递正能量。有专家表示,该剧不仅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加入了大量现代化的元素,使甬剧这个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地方剧种焕发出崭新的活力,让人耳目一新。

## 河北小说艺委会举行2014年笔会

**本报讯** 河北小说艺委会2014年笔会近日在秦皇岛举行。来自《小说月报》《十月》《小说选刊》《长城》等文学期刊的编辑与20余位河北作家就小说创作方面的话题进行了交流。

《长城》主编李秀龙认为,一部好的小说不应该只是描写人生表面的有趣,写生活故事的同时还应该写人生、写心灵的故

## 第三届川南诗会在自贡举行

**本报讯** 6月18日至19日,第三届川南诗会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诗会由四川省作协主办,《星星》诗刊杂志社、自贡市作协、中共富顺县委宣传部承办。梁平、曹纪祖、龚学敏等数十位诗人、学者与会。

第三届川南诗会由“诗在当下”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诗加建文学创作之路研讨和诗歌品鉴会组成。研讨会上,诗人和评论家们畅所欲言,介绍了本地区诗歌创作情况,并交流了各自的创作心得及困惑。梁平谈到,川南地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诗人 and 诗作,但近年来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诗人们要明确写作方向,努力改变现状。同时,诗人要具有担当精神,关注社会现实和热点问题,用富有感染力的诗歌语言表达真挚情感。在李加建的诗歌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诗作的思想性、艺术性等进行了研讨,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建议。

据悉,川南诗会自2006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三届,对促进川南地区诗歌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阮 闻)

事。《十月》副主编赵兰振表示,可读性强、读者爱读是他们选择刊发小说作品的唯一标准。《小说月报》副主编刘书彬则希望作家们多写让读者能够读懂的小说。与会者认为,河北作家属于写作很路实的群体,尤其是近年来他们立足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冀 文)